

主编：沈志华 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十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主编：郭 洁

第十一编 中国与第三世界

主编：牛 可



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07DTQ001)

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6)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1948~1976)



第十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主编：郭 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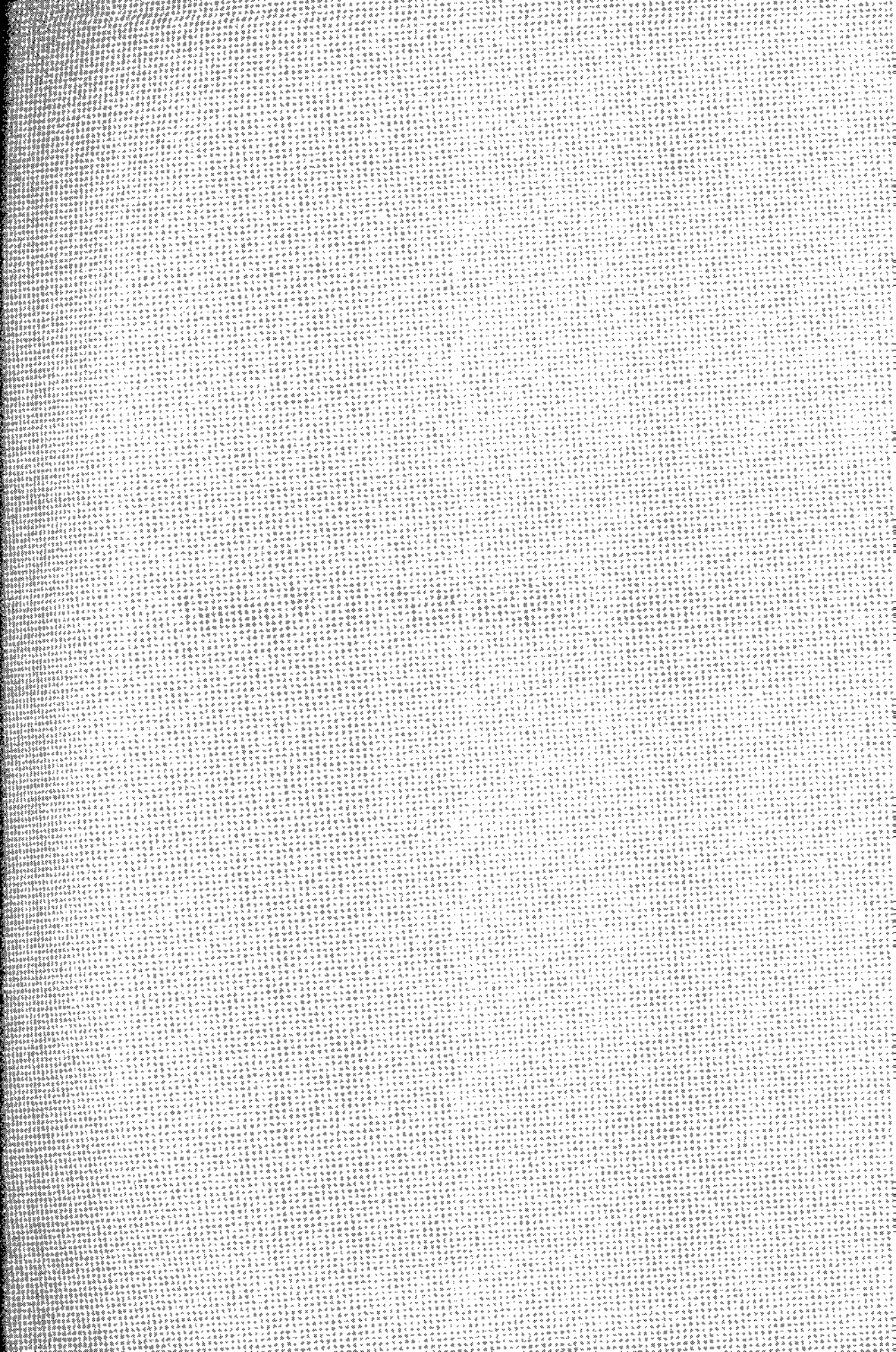
第十一编 中国与第三世界

主编：牛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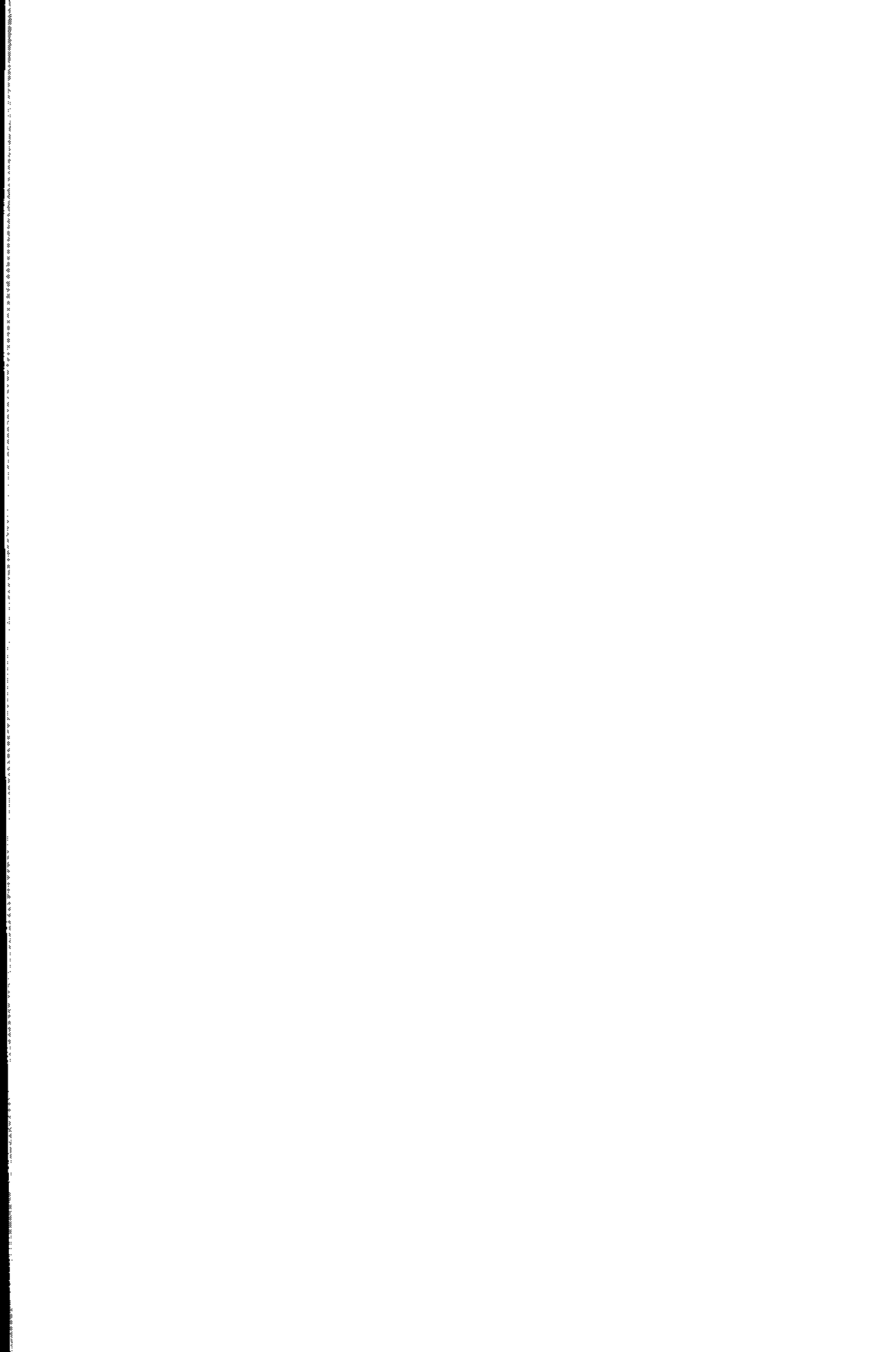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中心

第十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目 录

- 导论 郭 洁 / 5
- 10-1 中情局关于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弱点的情报备忘录(1949年9月20日) / 25
- 10-2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1953年中期苏联阵营形势的评估报告(1952年11月1日) / 50
- 10-3 中情局关于1953年中期苏联阵营潜能的评估报告(1952年11月12日) / 57
- 10-4 中情局关于1954年中期苏联阵营潜能的评估报告(1952年12月15日) / 66
- 10-5 中情局关于1955年中期共产党在亚洲行动的评估报告(1954年3月15日) / 75
- 10-6 中情局关于1954~1957年间共产党在亚洲行动的评估报告(1954年11月23日) / 83
- 10-7 中情局关于196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级研究报告(1959年7月20日) / 97
- 10-8 中情局关于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高级研究报告(1961年2月17日) / 111
- 10-9 中情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权威与控制的评估报告(1961年8月8日) / 130
- 10-10 中情局关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评估报告(1962年2月21日) / 148
- 10-11 中情局关于中国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影响力增强的特别报告(1963年5月17日) / 169
- 10-12 中情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评估报告(1964年6月10日) / 175
- 10-13 中情局关于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渐“孤立”的特别报告(1966年8月5日) / 187



导 论

郭 洁

美国情报系统的报告,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情报评估、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当前情报报告、基本研究报告等几大类。收入本编的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的相关报告共计13件,时间自1949年9月至1966年8月。除一篇有关对1953年中苏苏联阵营形势的评估报告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外,其他各件均系中情局的报告,即七篇国家情报评估、两篇特别报告、两篇研究报告以及一篇情报备忘录。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美国情报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国际共运)现状与走势的评估基本与实情相符,有些分析甚至是颇有见地的,当然,囿于情报和材料的不足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存有的先见,某些建立在猜度基础上的见解如今看来与事实存有较大偏差。这里,笔者将就本编文件所反映出的美国中情局对国际共运的分析进行初步评估。

通常来讲,国际共运迄今为止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由于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胜利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阶段。此间,社会主义逐渐由一国发展到了多国,并进而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在这期间,国际共运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曲折发展,渡过了团结协作与动荡分离相互交织的艰难历程。苏东剧变后,国际共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视其为第四阶段。有人将其称为“低谷”时期,亦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探索中不断前进”的阶段,但不管怎样,谁都承认,这一阶段仍在进行之中,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至少目前尚无法归纳出其总体特征。

本编所涉及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期间,中情局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部门对国际共运总体和局部形势的分析与评估。根据收录文件的内容,可将此间有关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以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划分为中苏结盟与合作(1949~1957)、中苏分歧与争论(1958~1964)和中苏分裂与对抗(1965~1966)三个时段,分别加以考察。

一、对中苏结盟与合作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49~195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欧洲,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纷纷抛弃了原有的政

治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①在亚洲,继越南、朝鲜先后确立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政权之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历经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內战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此,连同苏联和蒙古,欧亚大陆上共有13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扩展的过程中,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国际共运整体实力的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将其同苏联核试验的成功^②并称为1949年这个标志着“冷战扩大”的年份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事件。如果说苏联拥有核武器加大了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宣告了“以恐怖实施共同威慑”的新时代的到来并史无前例地造成了美国人自此之后将“必须在全部毁灭的魔影下生活”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则代表着国际共运对所谓自由世界进行军事和政治干预能力的增强,在美国人看来,其结果将会对世界权力格局和“国际安全”造成重大冲击。^③1950年,随着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确立,此种认识更是进一步得以加深。当时,美国朝野的一个主流观点即是:美国及其盟国正面对着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诚然,不可否认,在此主流之内亦有些人士对“铁板一块”的说法提出了某种质疑。比如本编10-1、10-3文件,均对中苏未来分歧的诱发因子、中国的民族诉求及其所拥有的相对独立性和领导亚洲共运的能力作出了被后来事实证明颇具预见性的评估。不过,在这样一些分析之后,结论往往又复归“正统”立场,即认为“紧密的意识形态联系”、欲将西方的影响“从远东清除出去”的共同目标,对传播共产主义和倡导世界革命的坚定信念,是双方保持密切协作并推动国际共运不断壮大的黏合剂。用20世纪50年代曾先后供职于兰德公司和中情局的研究人员雷蒙德·加特霍夫的话来讲,如果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的破裂在国际共运这块铁板中造成了一道裂缝,那么此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则令这道裂缝显得不那么重要了。^④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潜能,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中情局,都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估。以1952年底先后出台的本编10-3、10-4文件为例,两份报告均特别指出了:从经济实力来看,苏联的经济产量不比美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经济实力亦不可与北约同日而语,但由于其国民收入中用于军事支出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差别较大。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波兰名义上是共和国但实际上实施的是军事独裁,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国走的是法西斯专政的道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则奉行君主制。

② 1949年8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苏联第一颗钚装置的原子弹(代号第一道闪电)试爆成功。苏联核能力的取得,根本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平衡,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

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p. 36; CIA/SRS-45, 1961年2月17日;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三),樊迪、静海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 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另外有关1948年苏南冲突,可参看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Ivo Banac, *With Stalin against Tito: Cominformist Splits in Yugoslav Commun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Adam B. Ulam,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viet Yugoslav Disput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3, No. 1, 1951; Charles C. Stefan, "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6, No. 4, 1982.

的比例远远高出西方国家,使其现有军队及常规军力较之后者,拥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据此,评估人预测:苏联集团有充分能力在横贯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除此之外,报告还强调:除了军事进攻的能力外,集团的庞大规模(包括2000余万共产党员和遍布72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集权化的领导以及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等,为共产党人实施政治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能,使其能够借助于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宣传的等多重手段,对“自由世界”及其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其实,对所谓“苏联集团”坚如磐石的拍象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势不两立的估计,自冷战格局形成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在美国各界人士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此种认识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继而朝鲜半岛停战之后,亦未能得以及时调整。现在我们知道,上述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前者)对于当时以及其后的整个冷战氛围产生了极为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突然去世。十天后,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党政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部长会议主席由苏共十九大时受斯大林委托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担任,四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分别为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就任苏共中央书记,伏罗希洛夫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会上,马林科夫就新政府的外交方针做了详细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著名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方式,在共同一致的基础之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并称这一原则适用于处理苏联“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①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实际考虑,比如:减轻由于美苏对抗特别是核武器的无限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和危险,减轻由于军备竞赛所造成的过重的经济负担,以便将更多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等方面。遗憾的是,对于莫斯科抛出的橄榄枝,白宫领导人始终疑虑重重。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一向是不妥协的,而苏联人从来是没有诚意的,斯大林继承人所谓之新方针无非是些“花言巧语的诺言”。^②1953年4月16日,就任不久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马林科夫的上述讲话首次作出回应。在这篇名为《和平的机遇》的演说中,新总统对与苏联缓和关系开出了种种具体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结束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叛乱,同意联合国核查裁军进程;释放德国俘虏,促进德国统一并在此基础上经自由选举产生政府;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等。^③一个多星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其发表的政策演说《第一个九

①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3*.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6, pp. 12-13.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一),第82~84页。

③ 艾森豪威尔演说“和平的机会”,1953年4月16日。参见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28 No. 722, pp. 599-603,转引自 Walt W. Rostow, *Europe after Stalin: Eisenhower's Three Decisions of March 11, 1953*,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pp. 113-122.

十天》中,亦称苏联外交的上述变化无非是麻痹西方的策略之举。^①然而,其后的事实表明,苏联新领导人的确在缓和的路上迈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步伐,比如:他们主动宣布放弃对土耳其喀斯、阿达罕和阿尔特温地区的领土要求并暗示愿意放弃先前提出的苏土两国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推动交战双方达成朝鲜停战协议,从而使一场耗时三年的热战宣告结束;建议西方国家吸收包括苏联在内的新成员加入北约,以维护欧洲安全;同意从奥地利撤军、与西方国家共同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并承认奥地利中立地位;向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裁减军队、禁止核武器及消除战争威胁的动议并率先实现单方面裁军;对联邦德国予以承认并与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等。

除了采取主动改善东西方关系之外,为缓和斯大林逝世前东欧各国业已出现的社会紧张,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苏联领导人还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先后推动东德、匈牙利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改革举措,用以纠正和解决苏联模式在匈牙利推行后暴露出的弊端和衍生出的问题,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改变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立法与行政机关的权力;健全法律制度,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修改国民经济发展方向,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提高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鼓励发展个体私人经济,开放市场,促进城乡商品流通;以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减少税收、增加住宅等手段改善人民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提高其政治、经济待遇;加大教育投入;对宗教事务保持宽容,等等。^②此外,1955年5月26日至6月2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进行了访问,采取主动姿态恢复了双方自1948年以来中断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国家关系。

然而,在斯大林逝世之初,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却全然未料及这一切会发生,事实上他们所做预测恰恰与此相反。以中情局1953年3月12日编发的一份名为“斯大林逝世与马林科夫升任苏联领导人可能出现的结果”的特别评估报告为例,其中便明确写道:“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国家的控制是如此之牢固,我们认为,斯大林之死不会令此种控制力发生丝毫减弱……铁托与莫斯科的关系亦不可能因斯大林之死而有何改变……铁托在卫星国家或阵营外共产党中的影响不会有所增长。”字里行间透着十足的把握。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份评估对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的可能走势却做出了大体合理的推断,报告撰写人称:“我们以为,斯大林之死不会立即对中苏合作或中共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斯大林的继承者中无人在亚洲拥有像斯大林那样的影响和声望,毛作为亚洲共产主义领袖和理论家的地位无疑将会上升,他在决定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方面也将会拥有更大发言权……新的莫斯科领导人可能必须小心

① 杜勒斯演说“第一个十天”,1953年4月27日。参见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28, No. 722, pp. 603-608,转引自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5)》,第十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② 以东德和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尝试为例,相关措施可参阅 Christian Ostermann, “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5, Spring 1995, pp. 10-12; 匈党中央六月决议《关于党在政策与实践中的错误及纠正这些错误的必要措施》,1953年6月28日, Csaba Be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1-32.

处理与毛的关系,若非如此,几乎必定会增加中苏间的紧张关系。”^①这一判断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如果说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包括斯大林继承人之间此后数年的权力争斗,并未使苏联在欧洲共运中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的话,那么在亚洲,随着毛泽东威望和地位的相对上升,亚洲共运的格局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对中苏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至少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三四年间,中苏关系从总体上看发展良好,在处理国际共运内部事务方面,双方保持了密切合作。中情局的研究人员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1954年3月通过的本编10-5文件对此分析道:“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至少在此评估期间,将依然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报告进而对中苏两国保持合作的动力源泉进行了分析,其中写道:“苏联与共产党中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把美国视作实现其亚洲目标的主要障碍,并且都认为,美国的政策与力量使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不仅如此,各自目前均从同对方的结盟中获得了好处,共产党中国接受了苏联在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面给予的大量支持与援助,苏联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对自己有价值的盟友:它在远东提供了军事力量与深入防卫,还是进一步在亚洲推进共产主义目标的一个基地,不仅如此,与共产党中国结盟,还可以使苏联在分化和扰乱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时候,可以拿‘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价值不菲的政治和心理资本。”总之,在当时中情局分析人士看来,共同的目标是将双方“黏合在一起的力量”,而由此产生的互利结果则是促使双方保持并继续发展同盟关系的内在动力。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1956年无疑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中,国际共运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被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②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国际共运内部激起了剧烈的震荡。美国、英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共产党,由于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以及大批党员退党而发生了严重分裂。西欧两个资格较老的共产党意共和法共,则分别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了不同反应。意共对苏共二十大总体上持欢迎态度,其领导人陶里亚蒂甚至提议未来国际共运应当奉行多中心主义,按他的话说,“整个体系愈益朝着多中心方向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能强调单一领导,而要强调走多样化道路以实现进步”^③。相比较之下,法

① SE39,1953年3月12日。当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中苏关系的恶化已成事实后,中情局分析人士对此看得更为清楚了。比如,NIE 10-61中就有一段与此非常相似的论述,报告指出,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即刻削弱了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在当时的形势下,“事实上只有一个人的威望接近于斯大林,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参见NIE 10-61,1961年8月8日。

② 参见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之三),《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第4版。

③ P. Togliatte, “Rapporto all’VIII Congresso”. Riuniti ed., *Nella democrazia e nella pace verso il socialismo*, Rome, 1963, p. 32. 转引自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姜辉、于海青、鹿晓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

共的反应则显得保守。它不仅对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形象的做法深感不满,还对意共提出的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概念和坚持议会道路的重要性等看法严加批判。^①较之上述欧美等西方国家共产党,东欧各国党的反应显得更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表现得茫然失措。^②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情况,已不是“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忽然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同时,因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情绪、社会民主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③在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非不对二十大后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作出积极反应,且逆流而上继续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实行斯大林时期的强硬路线。潜伏于民众中的普遍不满与种种压力下党和政府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引发了政治危机。

6月28日,首先在波兰南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1956年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选举前波党总书记、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取代接替贝鲁特的奥哈布,出任波党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得到此信后极为震怒,当天即命令部队进入波兰境内,随后赫鲁晓夫率苏共中央代表团飞抵华沙,力图阻止哥穆尔卡的当选。面对如此情形,波兰领导人并未妥协,反而据理相争。后经双方长时间谈判,苏联领导人最终决定放弃干涉,返回莫斯科。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波兰事件尚未尘埃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一场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短短数小时后,骤然转变为各阶层市民与国家安全警察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后,匈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对党和国家领导层进行重大人事变动,被迫将在示威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纳吉选任为国家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次日下午,在没有获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请书的情况下,苏联军队展开了代号“行动波”的第一次干预行动,不料此举迅速激起了匈牙利民众反苏情绪的日益高涨。于是,一场原本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一步步偏离了最初的目标,危机中涌现出的大量政治团体出于不同目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撤走所有苏联驻军,恢复多党联合执政,实行自由选举,退出华约组织,宣布国家中立等,不一而足。面对国内外的沉重压力,纳吉政府处境异常艰难,无论其是进是退,终无法令各方满意。匈牙利局势持续恶化。在此情形之下,11月4日,苏联派遣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旋风”的第二次军事行动,镇压了这场事件。

1956年苏联以武力方式干涉和镇压匈牙利事件,不仅在战后东欧史上留下了深刻烙

① 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第303~304页。

②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③ Brzezinski, Zbigniew K.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42-253.

印,并且对日后国际共运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举其要者而论:其一,它使东欧各国政权对激进式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在其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自制改革的基础;其二,它在阵营外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内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混乱,其中又以意大利党最为严重;其三,它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宣扬的正义、和平等理念受到了质疑,比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及其后,在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都发生了声援匈牙利的盛大示威游行;其四,它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力量的进一步分化,使得国际共运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受到了极大撼动;最后,它对于苏联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道德和政治权威造成了损害,如此一来,便如同本编 10-9 文件所说,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共运“政治和理论层面的权威性领导”的缺位。其后不久的事实日益清晰地表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能力并有意愿填补这一空缺的,便是一直以来享有相对独立地位并在亚洲与苏联共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早在波匈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之中,中国已经以国际共运另一个权威和领袖的姿态,表现出一个亚洲社会主义大国对欧洲共运事务的关切和影响,并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历程。^①本编 10-9 文件认为,对中国而言,1956 年的东欧危机“既是麻烦也是个机遇”。一方面,同苏联一样,中国希望尽快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但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在苏联人犯了错误之后”,通过“帮助莫斯科恢复它在东欧遭到严重动摇的权威”来扩大和施展自己国际共运的影响力,并使其“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走向团结。本编 10-8 文件甚至将中国对东欧危机的介入视为“另一个巨人时代”到来的标志,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唯一健在并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英雄典范的地位”。此说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并非言过其实。1956 年底至 1957 年春,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两个理论成果,即 1956 年 12 月 29 日公开发表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和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的讲话,^②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混乱局面,表明了中共对于当时国际共运中亟待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历史问题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在各国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③1957 年初,为了调解苏

① 有关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中文著述可参阅沈志华《1956 年 10 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19~143 页)和《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第 75~89 页)。相关英文著述可参看 János Radványi, *Hungary and the Superpowers: The 1956 Revolution and Realpolitik*.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2, pp. 21-29;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145-162.

② 分别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第 1~2 版)和《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再论》和《正处》发表后,各国党的机关报纷纷予以转载或发表评论文章。以《再论》为例,1956 年 12 月 29 日,就在《人民日报》刊发当日,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转载了其中主要内容(次年 1 月 9 日,又用两个版面予以全文转载),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红色权利报》予以转载,31 日,苏联《真理报》几乎全文转载;1957 年 1 月 1~2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人民自由报》以“中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经验,斯大林的作用和错误,匈牙利事件与南斯拉夫同志的观点的立场”为题连续两天刊载了摘录文章。参见《参考资料》1956 年 12 月 30 日至 1957 年 1 月 5 日。

联同波匈两国的关系,周恩来连续出访上述三国,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对于阵营内部事务的关切和在维护团结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赢得了广泛好评。在西欧,许多共产党人甚至由此认为,“北京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及理论重心”。^①不过,事实上直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虽然国际共运两个权威来源的前景已依稀可见,但中国并未对苏联在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发起真实挑战。1963年本编10-11文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总结说:“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想要实现的目标还很有限。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以便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所推行的这些对外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悖。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应当由一个国家来领导,并由其确立总的路线,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重要的成员进行协商。中国人视苏联为统帅,同时将自己想象为重要的智囊人员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1957年11月16~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可以算得上是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运动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共有6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对国内安全法实施的情况调查报告中甚至将其称作“共产国际的复活”。^②在此次会议上,中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显示出对国际共运所具有的影响力和与苏联分享运动领导权的潜能。虽然会议意图将南斯拉夫重新拉回社会主义阵营的愿望最终落空,并且各国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分歧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在中苏双方通力合作之下,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体恢复了团结与稳定。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仅在莫斯科会议闭幕后半年,在团结和稳定表象之下潜伏着的脆弱与危机便无法抑止地显露出来。从那时起,中苏两党在有关国际共运战略方面业已存在的分歧,便通过一系列事件不断加深并最终得以爆发;与此同时,随着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中共亦不再隐藏其内心深处对国际共运单一权威体制的不满,开始向苏联的领袖地位发起了挑战。

中苏双方党际和国家关系的持续恶化,终于致使国际共运在战后发生了第二次分裂。较之1948年的苏南分裂,中苏关系的破裂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持续时间方面,均远胜于前者,并对其后国际共运以至整个冷战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对中苏分歧与争论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58~1964)

根据本编文件的具体情况,为便于描述起见,以下将就美国关于中苏分裂时期国际共运的情报评估进一步划分出两个时段,分别考察中苏关系破而未裂以及彻底破裂前后国际共运的总体趋势及其所受影响。

①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关于西欧对周总理访苏、波、匈的反应给外交部的报告,1957年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097-06,第94页。

② 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对国内安全法实施情况调查报告“共产国际的复活及其对美国的意义”(The Reviva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1959年9月。

如上所述,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根本理论与基本政策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双方在关于时代的特征、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与模式、国际共运的发展战略等问题上看法相异;具体到国内外政策层面:究竟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立场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

客观地说,中苏分歧在双方关系发生恶化之前久已存在,甚至早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国对苏联领导人的某些政策与做法已心怀不满,不过,此种不满由“敢怒不敢言”发展到“直言不讳”,则是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事。当时中国虽然在公开场合继续肯定甚至维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提出坚持“以苏为首”,但其潜台词却是:苏联党的这种中心地位是需要中国党的支持和肯定才能生效的。^①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由于双方在以上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分歧有增无减并日益显露,中苏关系开始定出“蜜月”,迈向恶化。对于中苏分歧的肇始及其核心,本编10-10文件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该文件指出,中苏之间的“敌对和不满”其实“蛰伏已久”,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发展成为一个尖锐而公开的问题”,虽然从表面看来,争论的都是些具体问题,但就其实质而言,分歧的焦点只有一个,即国际共运的领导权。^② 不过,中情局并不认为,此时中苏关系中出现的磨擦与冲突会对双方同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其看来,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仍是双方保持同盟关系的强有力的纽带。

正基于此,1959年夏,就在中苏友好关系已明显趋冷的情形之下,本编10-7文件对未来五至六年国际共运的前景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声称:“如果世界在1965年之前逃过一场大战,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家的经济绝对会有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力量的强大将必然增强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将可能扩大他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自由世界中许多民族国家的共产党无论在人数还是影响方面都会更为强大,并在某些国家中成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主要反对力量。”文件还指出,届时共产主义可能在世界上所有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南亚、中东和拉美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样,对于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主笔人写道:“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国际共产主义仍将控制在苏联共产党的手中。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不大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任何削弱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角色’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任何运动的‘民主化’都会是革命性的。任何一个党或党的领导人对此若有质疑,几乎必将招致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而

① 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1958~1960)》,载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② 不过至于中苏分裂始自何时,美国政界有许多不同看法。就中情局而言,统一的看法是将1956年苏共二十大视为双方分歧的起点,参见中情局当前情报处1966年4月22日发表的研究报告《1956~1986年中苏关系的恶化》(CIA Research Report,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1956-1966.” p. 12. Paul Kesaris, ed.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1946-1976*. Frederick, Md. 1982, Reel 2);中情局局长艾伦·扎勒斯本人亦持此立场,参见Memorandum, Allen Dulles, “Development of Sino-Soviet Dispute.” p. 1, *Allen Dulles Papers*, Box 106,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转引自戴万钦:《甘尼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版,第77页。

在遵从正统的共产党人的眼中,修正主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威胁”。虽然,该文件也曾考虑到国际共运处于苏中两党双重控制之下这一可能性,但随后举出大量论据,用以说明此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撰写人认为,作为“唯一可以挑战苏联权威的政党”,中共虽然对于培养和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怀有浓厚兴趣”,但就其对阵营团结的强调和对“以苏为首”原则所做出的表态来看,中共不至于对莫斯科的领袖地位发起挑战,原因在于:首先,维护阵营的团结对于中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不会让自己因此背负违背正统、搞修正主义的骂名;再次,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中国都迫切需要苏联给予支持与援助,这会使其继续支持苏联在阵营中的领导作用;最后,中国的任何挑战之举都很难赢得阵营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因为后者不会“背着莫斯科,在中苏关系上捣鬼”。

除此之外,该文件以下观点也特别值得关注:第一,预测在未来五至六年间,南斯拉夫还会被各国党视作“修正主义的中心”并受到攻击;第二,强调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欧各国中,存在着偏离正统路线、尝试搞“民族共产主义”的迹象,但其严重程度不足以对中共、苏两国的社会主义构成根本威胁;第三,认为凭借苏联的综合实力、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会“由先前的崇尚暴力转向力主温和”。从理论角度来看,中情局的上述分析符合逻辑,但实际情况却发生了重大逆转: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在国际共运中,何为正统、何为修正渐渐失去了明确和统一的标准。令中情局始料不及进而颇感费解的是,正统和修正之争并未像其预测的那样,发生在“所有国家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却出现在就其看来意识形态最贴近“正宗”的中、苏两党之间。相应地,共产主义世界也并没有步调一致地实现从倡导暴力革命向苏共所主张的和平路线的转变,而是在意识形态分歧难以调和的基础上,催生出了两条彼此尖锐对立的总路线。

1960年,中苏关系的恶化日益走向公开。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放弃了此前的克制立场,向前来参会的各个代表团正式公开了与苏共在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针对中国的这一做法,莫斯科立即在随后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进行了反击。6月21日,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三天,苏共中央向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散发了长达50多页的情况简报,其中对中共在诸如时代特征、和平与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赫鲁晓夫甚至出言,“只有疯子和狂人才谈论新的世界战争”。^①简报还指责中共利用世界工联等国际社会组织宣传自己的观点。^②此举一出,结果便如本编10-15文件所说,“掀起了双方相互攻击、漫骂的高潮”。会上,各代表团中除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以外,均站在了苏联一边谴责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用本编10-9文件的话来说,中国代表团被置于“一种受审的境地”。最后,根据

① 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讲话,1960年6月21日,转引自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ed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Harlow: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pp. 19-20.

② 奥·鲍里索夫、鲍·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21~522页。

各兄弟党的委托,苏共提议于11月各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之际,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辩论。此后直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中苏各方均表现得咄咄逼人、互不退让,致使双边关系严重趋紧,甚至表现出分裂之势。从某种意义上,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算是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中苏分歧从两党之间延伸到了整个国际共运,并使表面看来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信仰、两种声音的局面。

对于中苏分歧给国际共运未来发展带来的隐患,阵营内各国党均深感忧虑,他们希望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能够推动中苏双方通过协调停止论战,使国际共运的团结得以恢复。中共亦怀有同样的期待,并预先通过各种方式作出了明确表示。然而,11月初当各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后,苏联却出人意料地向参会各国共产党散发了一份多达6万余字的信件,信中对中共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如此,旧伤疤尚未愈合,复又被揭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就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国际共运的团结以及调整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激烈争执。苏联力图使中共承认自己的领导权威和路线主张,而后者却坚持己见,只愿在战略层面作出让步,双方僵持不下。为使会议不至无果而终,经多方共同努力,中苏两党终于在反复磋商后达成妥协。12月1日,大会最后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声明将中苏各方的观点加以糅合,通过一种妥协性安排,将分歧与争执暂且搁置或予以回避,并在此基础之上,使国际共运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只是,由于矛盾的症结并未化解,分裂的阴影也依然存在,此种团结显得异常的脆弱并令人堪忧。

对于这次莫斯科会议,中情局在其后不久出台的本编10-8文件作了专门的探讨。研究人员依据当时非常有限的信息来源(很大程度上主要参考的是像《莫斯科声明》^①这样一些公开发表的材料),就莫斯科会议的意义、《莫斯科声明》对于国际共运的影响等进行了评估。

从总体上看,10-8文件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同当时西方世界的普遍认识不相一致。该文件的基本观点是:无论从规模(共有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团参会)、持续时间(长达四周)还是议题的重要性来看,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远非1957年的莫斯科所能比拟。此次会议恢复并且增强了各国党之间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国际共运内部权力分散化和组织关系平等化的总趋势。在报告撰写人看来,为莫斯科会议画上了“圆满”句号的共同声明,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新的纲领性文件”,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不仅“挽救了运动的团结”,并且推动其进入到一个“更有自信心、灵活性和力量的时期”。同时认为,由于声明“将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进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大大增强了共产主义运动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而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扩展,将催生出某种较之社会主义“集团”更为高级的类似于“联邦”或“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机

^① 声明首见于1960年12月6日《真理报》。